

温暖往事 回味悠长

■崔国奎

就这样,他当兵10年,放牛7年……”

新闻敏感性极强的鲁组长,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线索。他向刘干事提出意见包庆玉的妻子白淑兰。

不久,白淑兰来到了我们面前。由于长年在野外风吹日晒,白淑兰的脸呈紫红色。她的普通话讲得并不标准,但我们还是从她的言谈中,知道了一些包庆玉的故事。

第二天,我们乘坐吉普车行驶了七八个小时,才到达位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的敖都木。隆冬时节的敖都木,白雪皑皑,寒气袭人。前哨五连就驻扎在这里。

这里沿途荒山绵延,数十里杳无人烟。连队几幢营房在寒风中屹立,官兵在训练场上喊着响亮的口号,使这片寂静的土地有了生机。

二

一天傍晚,鲁组长、刘干事和我在一名连队干部的陪同下,借着皎洁的月光,踏着厚厚的积雪,向团后勤牧场走去。

草原的夜,寒冷宁静。我们迎着刺骨的寒风,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。除了风声,就是我们踩着积雪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。

当一个蒙古包出现在我们眼前时,突然传来一阵又一阵狗叫声。一只大黄狗拦住了我们的道路。

见此情景,刘干事喊了一嗓子:“大黄,别叫了!”

大黄狗立刻听话地停止了叫声,一溜烟地跑过来,在刘干事身上嗅来嗅去,不停地摇着尾巴。1个月前,刘干事曾专门来这里采访过包庆玉,知道这只狗叫“大黄”。“大黄”也逐渐跟刘干事熟悉了。

包庆玉的妻子白淑兰,把我们热情地迎进了蒙古包。

蒙古包里非常暖和,炉子里的干牛粪正燃烧着,炉火很旺,上面煮着的奶茶,“咕嘟咕嘟”冒着腾腾热气,飘出了一股股奶香。

一位60多岁、满脸皱纹、身着蒙古族服装的老妈妈,也起身迎接我们。她正是白淑兰的母亲。

当时是晚上7点多,包庆玉外出放牧还没有回来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,蒙古包外传来“嗒嗒”的马蹄声,接着就是阵阵吆喝牛的声音。“大黄”闻声兴奋地蹿了出去。

白淑兰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:“老包放牧回来了!”

当包庆玉拉开蒙古包的帘门,我借着油灯微弱的光看到,一个个子很高、身体健壮,像一座黑铁塔一样的汉子立在了门口。

当他脱去身上的皮大衣,摘下棉帽,我才看清楚,这是一张古铜色的脸庞,眼睛不大,高高的颧骨,是个非常典型的蒙古族汉子。

他伸过来一双粗糙的大手。当他握着我的手时,我好像被一把铁钳钳到一样,非常有力。

包庆玉不认汉字,但他的汉语表达能力较强。我们和他聊着家常,听他慢慢地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“这个牧场,原来只有64头牛,一顶破旧的蒙古包。我入伍10年,有7年时间过着‘游牧生活’。从夏初至秋末,牛走家搬,盐水下饭,也是放牧者一年中最辛苦的季节。每年游牧归来,我就成了‘野人’,头发长了,人又黑又瘦,但马牛羊却个个膘肥体壮,牧场的牲畜有栏数升至150头。妻子随我常年风餐露宿,患上风湿病,有时双腿又疼又肿。家里活儿比较多,我只好把岳母从城里接来,帮妻子分担一些。因部队几番精简整编,牧场隶属关系几经转换。虽然现在我还未转上‘志愿兵’,但我是一名战士,感到自己责任重大,更要时

刻听党的话,尽心尽力为部队贡献自己的力量……”

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,一个个真切动人的画面,展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就这样,我们在蒙古包里采访了3个晚上,数次流下感动的热泪。

为真实反映包庆玉在冬季时放牧的生活,我们还和他一起来到几十里外的放牧地方进行体验,其艰苦程度令人难以想象。

“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。”在敖都木的日子里,我和鲁组长及刘干事,完全被包庆玉的事迹所感染、打动。我们很快动笔,在一周之内满怀深情地撰写出5000多字的长篇通讯,记录下包庆玉的事迹。

三

付出总有回报。1986年2月18日,《前进报》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长篇通讯《牧牛人——记赤峰守备区某部战士包庆玉》。

1986年3月5日,在原沈阳军区八一剧场,举行了纪念学雷锋23周年总结表彰大会。包庆玉的先进事迹报告引起现场官兵强烈反响。

反映包庆玉事迹的稿件,经过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进一步挖掘采访,最终在《解放军报》头版刊发。平凡铸就伟大。默默无闻的牧牛人包庆玉,一时间成了原沈阳军区乃至全军的新闻人物。

时代需要楷模,像包庆玉这样卫国戍边、乐于奉献的官兵,为部队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年华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。与此同时,我在多年后的今天,仍然会回忆起当年陪着丈夫“风餐露宿”放牧、风尘仆仆到团部为丈夫换军装的军嫂白淑兰,还有包庆玉那从城里来到牧场的岳母……这些温暖往事,让我回味悠长。

家庭秀

一枚小小的奖章
一枚金色的太阳
阳光闪耀在幸福的脸庞
它是一簇簇金色花蕊
凝聚着这个家庭的芬芳

他们是一片片彩色花瓣
欢声笑语在身旁绽放
一个军人的荣誉
一个家庭的担当
金色跳动着军人的浪漫
幸福比岁月悠长

尹 婧配文

定格

近日,第71集团军某部干部刘亚军的妻子和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刘亚军与家人分享获得的荣誉证书和奖章。

赵根沅摄

目送

■杨元超

离家时,回头就能看见她倚在窗台上,目不转睛地看着,直到我慢慢走远,消失在她的视线里。尤其是在东北老家的深冬,我与奶奶分别时常常天色已晚,屋外阴沉沉,雪簌簌下个不停。奶奶的目送中,又多了几分凄凉。我不忍向后看,只得大步快走,但奶奶的神情、动作,会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。

奶奶是军人的妻子,也是军人的母亲、祖母,这样的分别与目送,她一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回。她曾目送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刚回来不久的丈夫,前往大学校园开启求知之路,自己则独自扛起照顾公婆和孩子的重任。她曾在大年

初一这天,目送着儿子和女儿离家前往部队,阖家团圆的余温似乎还在,家里却已然冷冷清清。她曾发着高烧坚持把我送出家门,又目送着我走远。我一步三回头,她就笑着摆手,不愿让我牵挂忧心。

奶奶一辈子跟着爷爷走南闯北,对军人和军队有很深的感情。有人说,军属都习惯了分别。其实,她们是选择了奉献和付出,支持亲人去守护更多人,把离别的不舍和伤痛留给了自己。一次,爸爸回家看奶奶,只半天时间就匆匆返美援朝战场刚回来不久的丈夫,前往大学校园开启求知之路,自己则独自打起

照顾公婆和孩子的重任。她曾在大年

那年那时

今年春节前,我与几位早年在部队一起从事新闻工作的战友相聚,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当年如何发现先进典型人物——牧牛人包庆玉。思绪再次把我带回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1985年底,我和赤峰守备区报道组鲁组长一起,前往守备六师前哨五连采访。

因前哨五连驻守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,距离团部150多公里,加之已近傍晚,我们只好临时住进这个团的招待所。

闲聊中,与我们同行的守备六师报道组刘干事,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他说:“团后勤处负责发服装的助理,不小心给一个1米84的彪形大汉,发了一套小号军装,你说能穿吗?这不,他老婆白淑兰专程从他工作的牧场,跑了数百里地来团里帮他调换服装。晚饭前,我还见到了她,就住在咱们隔壁。”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鲁组长觉得这里边一定有故事,便让刘干事再讲细一点。

刘干事便绘声绘色地说:“这个团有个放牧点,离前哨五连有二三公里。这里有个放牛战士叫包庆玉,蒙古族。包庆玉1976年入伍来到炮兵连,是连里出名的‘包大汉’,才干了两年就受到连里嘉奖,还入了党。1979年初,部队调整人员,包庆玉被调到团后勤牧场放牧。开始,包庆玉也想不通,为啥让他去当‘牛倌’?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,他终于想通了——团里牧场总得有人放牛。”



家人

那天,年近90岁的母亲独自坐在床边,捧着一个陈旧的饼干盒专心致志地看着。

“妈,里面装的什么宝贝啊?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没什么,都是些老物件。”说完,母亲将饼干盒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床头柜里。

第二天,趁母亲外出散步,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了那个饼干盒,打开一看,里面是个用红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。我好奇地打开了它,映入眼帘的竟是我多年前寄回家的一封信。信的开口都很整齐,显然是用剪刀细心剪开的。每个信封的右下角都编着号码,最后一封是136号。这些家信的下码,还夹着一个本,里面贴着一枚枚从信封上剪下的“义务兵免费信件”三角戳,正好136枚。那些三角戳红红的,排列得非常整齐,如同一团团跳动的火焰。看到这一切,我的心猛地颤动了,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立刻涌遍全身。

1991年12月,我参军入伍。出发前,母亲帮我整了整军装和背包,一遍又一遍地叮嘱:“到了部队,就快些写封信来,让家里放心……”

我登车前,母亲又气喘吁吁地从不远处的一家杂货店里跑来,手中拿着一摞信封和信纸,边往我挎包中塞边说:“这信封、信纸你带着,部队管理严,出来买怕不方便。”想了想,她又说:“要是训练紧张,就写简短些,哪怕三两句也行……”

“嗨,知道了,知道了!”我急切地打断了母亲的话。当时的我,正沉浸在穿上军装的兴奋中,根本无法体会母亲的心情。

那天,我们这些新兵在亲人们不舍的目光中出发了。我探出头去,和母亲挥手告别。母亲紧跟汽车跑着,边挥手边喊道:“记着来信啊……”

入伍不久,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我,才真正体会到了家信的分量。父母的来信,总是厚厚的,不厌其烦地询问伙食怎么样、训练苦不苦、和战友们相处好不好,字里行间流露着关爱。艰苦紧张的训练之余,捧读那些厚厚的家信,一股暖流便会在心底久久荡漾……

那时,每次来信,连队通信员总是先发给班长。为了激励我们加强体能训练,班长定了个规矩:来了家信,必须连续读完30个俯卧撑才给。每回收到家信时,大家做俯卧撑都特别有劲,一边做,一边眼巴巴地望着班长手中的信。那时,我写的家信篇幅也很长。因为新兵连训练很紧张,自由支配时间很少,我每天只能抽空写上几行,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天。最长的一次,我花了一周多才写成,密密麻麻有12页,装进



给爸爸跳支舞

■李木强 王垣缤

迷彩军娃

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呀?”周末,海军某部干部于超的女儿小红星在视频里问他。

“咱们这儿就是爸爸的家啊,咱们跟爸爸是一家人。”于超的妻子董建敏温柔地向小红星解释。

小红星摇了摇小脑袋说:“我去过爸爸的家,爸爸的家在船上。”

这几年来,“以海为家”是于超的日常。小红星出生时,于超没能回家。随着小红星渐渐长大,对她来说,“爸爸的家”应该是有爸爸的地方,而那个地方就是舰艇。

虽然“爸爸的家”在远方,但期盼与爸爸团聚、给爸爸惊喜的童真愿望一直萦绕在小红星的心头。去年,小红星告诉于超,儿童节最想要的礼物就是爸爸能到幼儿园看她跳舞。于超答应了女儿的请求。

为了能让爸爸看到自己精彩的演出,小红星在排练中非常刻苦。可是,儿童节那天,于超因紧急出航,无法赶来幼

信封里沉甸甸的。

日子过得很快,我渐渐褪去新兵时期的青涩。每次匆匆铺开信纸,那种很不能写上几天几夜、把大小事一股脑儿向家人倾诉的感觉,似乎淡了许多。家中来信却依旧,母亲总忘不了在信尾添上一句话:“有空就回信,要是忙就少写些。”

1994年,我考上了军校。在新环境里,新兵时对家信热切盼望的感觉,仿佛又回来了。我坚持每周给家里写封信,和父母说说军校的事。后来,由于每天的生活非常规律,我写信的周期便越来越长,内容也非常简短。1995年,家中安了电话,我平时有事就跑到学校的电话亭打电话。随着许多现代化通信工具逐渐进入日常生活,家信便彻底“断档”了。

那天,沉浸在往事回忆中的我,竟没注意到母亲已散步回来。

“妈,我正在看你藏在饼干盒里的宝贝。”我说。

“嗨,能有啥宝贝,都是那些年你写给家里的信呗。人老了,没事时看看这些信,也挺有意思的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那一刻,望着母亲苍老的脸庞和满头的白发,我觉得眼睛湿湿的。这一封封记录我在军营里成长的家信,成了母亲这么多年的情感慰藉。

那天,母亲又将这些“宝贝”收进了饼干盒,并重新放回了柜子里。我知道,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,她一定会经常拿出来看看,心里牵挂着我,回忆着那段欣喜的收信时光。

情到深处

不久前,我读到一位历经战火硝烟的老革命军人在一本书中的自序:“1950年11月10日凌晨4点,我离家参军。母亲拽住我的衣襟不放,我只好把她的手掰开,向火车站赶去。年纪越增长,越理解那该死而别带给母亲的伤痛……中国革命的伟大,首先是母亲的伟大。”这段描述中的景是这样真,情是这样切,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奶奶。

虽然我的军旅经历并不长,但我最看不得的就是奶奶的“目送”。每次